

从汉字在日本的传播看中日文化交流史

阎 红 生*

Kanji in the History of Japan-China

Cultural Exchange

Yan HongSheng*

Received October 31, 1997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流源远流长。今年(1997年)是中日恢复邦交二十五周年。面对一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曲曲折折，再次回顾两千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对于展望二十一世纪，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和日本，自来有“同文同种”之谓。“同种”之说固不科学，日本借用汉字书写日语却是妇孺皆知的事实。汉字在中国生生不已，日本陆续接受，几乎是全盘承用。諸橋轍次博士编辑的《大漢和辞典》，共收入四万九千字，跟《康熙字典》不相上下(至于日本摹仿汉字所造的“国字”，如“辻”、“畑”等只有一百三十四个，不过是承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明治维新之中和二次大战前后，要求废除汉字之风曾几度在日本甚嚣尘上⁽¹⁾；但直至电脑迅速普及的今天，汉字仍是日本社会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昭和五十年，“日本汉字検定協会”成立，举行了第一回汉字能力検定(漢検)考试。以后，考生年年增加，平成八年已达八十五万人。有关“漢検”的书大量出版，汉字的“講習会”、“研究会”也在日本各地应运而生。为什么“汉字热”长盛不衰呢？“日本汉字検定協会”理事长大久保昇先生说：

“漢字には味があるんです。……私どもの漢字能力検定の受験者は年々増えているんですが、アンケートをとったらその目的は「自己啓発」というのが第一位です。漢字の面白さ、漢字文化の奥深さをもっと知って、知的財産をより豊かにしようという……漢字能力というのは実は日本語能力なんです。”⁽²⁾

汉字在日本流传和演变的历史，是日本借鉴和吸收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以形成、发展自己独特文明的历史，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可惜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国学界大多语焉不详，日本学者又分题过细，令人难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感。笔者不揣浅陋，拟对这一过程作一番爬梳整理。限于学力与识力，指陈不当之处，尚祈大方之家教正。

* 中国語学科

Department of Chinese

一、汉字开始传入日本

日本人从他们在日本列岛定居的时候起，就开始使用着日语。根据语言年代学的估计，现在在日本本州等地的语言和冲绳的语言出于共同的祖语，到公元前后分离开来，分别有了独自的发展⁽³⁾。如果是这样，那么具有两种语言共同的核心部分的日本祖语，必须说早已存在于公元前。但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至少是没有有过文字的证明。以前，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日本古时也有一种叫做“神代文字”的固有文字。江户时代(1819年)，一个叫平田笃胤的人，从日本各地的神社搜集这种所谓的日本古文字，集成《神字日文传》一书。但是，从日语音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字不能显示古日语的发音，显示的恰恰都是汉字传到日本后的日语的发音，所以这种“日本古文字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如斋部广成在大同二年(807年)的《古语拾遗》一书中说：

“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如果没有汉字的传入，日语的文字记述和阅读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根据日本史书的记载⁽⁴⁾，应神天皇十五年，

“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中国)经典……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

应神天皇十六年，

“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

过去多认为，应神天皇十六年(一说为公元285年，一说为公元447年)，王仁应天皇之诏，携《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来到日本，汉字就是于此时传入日本的。现在，这种“吾邦(指日本)有王仁而人读书识字”⁽⁵⁾的看法已被大多数学者否定，汉字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还只能说是一个谜。但有一点显而易见，从最初的时候开始，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就不可能无视大陆的影响。

在日本还没有文字的时代，当然不可能自己记录日本的历史，这种情况大约延续到七世纪初。七世纪前的日本史，只能依赖中国的史书文献。

班固(32~92年)的《汉书》上说：

“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⁶⁾

这是历史文献对日本列岛社会最早的记载。由此可知当时日本的统治集团，已经派使者同汉朝设在朝鲜乐浪郡的官衙进行往来，力求输入新的文化。《汉书》又载：

“天凤元年(14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值而罢大小钱……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二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⁷⁾

这种货币流入了日本，在日本西部的大阪、京都、对马和南部的福冈等地弥生时代中期的遗址中都出土了这种“货泉”，证明早在公元前后，日本就已经接触到了汉字。

日本天明四年(1784年)，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出土了一方珍贵的金印，印文是“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据范晔《后汉书》记载：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⁸⁾

金印的发掘与这段记载正可相互印证，说明汉光武帝刘秀确曾接见过来自倭奴国的朝贺使节，并且赐以金印、紫绶。此外，从奈良县天理市东大寺山的古坟中还出土过铸有“中平□□，五月丙午，造作支刀……”铭文的古刀。此处的“中平”，当是东汉灵帝的年号(184—189年)，唯此刀是当时灵帝下赐的，还是后代掺入墓葬中的，现在还不易遽作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倭王正企图通过交通汉朝来取得对自己王权的认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既然有求于汉，努力学习汉文，加强与汉朝的联系，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日本各地，先后出土了许多铭有中国年号的神兽镜。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的半圆方形带神兽镜铸有孙吴的年号与月日“赤乌元年(238年)五月廿五日”；大阪府黄金冢古坟出土的同形神兽镜铭有魏的年号“景初三年(239年)”；群馬县柴崎古坟、兵库县森尾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也铸有魏的另一个年号“□(正)始元年(240年)”；兵库县鸟岛古坟中出土的神兽镜上，不仅铸有孙吴的年号“□(赤)乌七年(244年)”，还有制作者的留名：“陈是作竟(陈氏作镜)”。此系中国人名无疑。由此和上述中国年号推知，这些大概是由中国传入的古镜。更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3月，在京都府弥荣町和峰山町四世纪后半期的大田南五号坟中，出土了铭有魏“青龙三年”(235年)年号的青铜镜，镜上有39字的铭文：

“青龙三年。颜氏作竟(镜)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详(祥)，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寿如金石宜免(侯)王”⁽⁹⁾

竟是一首意义清晰、韵律整齐的汉诗！这些中国制作的铜镜，在日本的关东、中部和近畿等地区内都有发现，它亦可与中国史籍的记载相印证。西晋史家陈寿的《三国志·魏志》记载：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

在魏帝给倭王的赐品中，有“铜镜百枚”，并郑重指示：“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正始元年，这些印绶、铜镜等赐品由专人送到倭国，“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¹⁰⁾。由此，想象如今出土的不少铜镜正是当时魏帝赐给亲魏倭王卑弥呼的礼品，恐怕并非毫无根据。古镜的鉴定人之一，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樋口隆康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¹¹⁾。1996年7月，从奈良下池山古坟中又发现了卑弥呼遣使朝贡时奉献给魏帝的日本古代丝织品——“斑布”，再次证实了《魏志》记载魏倭交往，有根有据，所言非虚⁽¹²⁾。

卑弥呼时，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已如此频繁，无疑，汉字在双方的交往中扮演着一种极为重要的角色。按照惯例，日本使节的朝贡要有表文，中国皇帝的回赠，也应有表文。上述“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即是显明的例证。日本使节带来的表文使用什么文字尚不清楚，但中国皇帝给倭王的表文无疑只能是汉字。日本当然需要有懂得汉字的人，才能够理解中国官方的文书。由此推想，当时日本已经有一些懂得使用汉字的人了。这些人大概就是所谓的“归化人”、“渡来人”或他们的子孙，即王仁那样从中国或朝鲜来的移民。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日本，已经接触和使用了汉字，这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陈寿还在《三国志》的《魏志》中记载了不少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国名、官名和人名等固有名词。国名有伊邪国、邪马国、斯马国等；官名有伊支马、狗古智卑狗等；人名有牛利、卑弥呼等，这是目前所知的用汉字注日本语音的最古的材料。

在汉字传入日本的同时，汉籍也陆续传到了日本。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有《日本刀歌》一诗云：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舛童老。
……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日本曾将徐福赉书说视为信史。1339年日本南朝重臣北田亲房在《神皇正统记》中写道：

“始皇好仙，求长生不老药于日本；日本则求五帝三王遗书于彼国，始皇悉数予之。其后三十五年，彼国焚书坑儒，孔子全经唯存日本矣”

实际上，徐福在中国始终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徐福赉书说不足为凭。但日本史书关于王仁将汉籍经典《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带到日本，教导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记载表明，至迟于公元五世纪，在日本教授汉字、汉文和汉籍已成为可能。此外，日本《皇国名医传》也记载：

“……汉灵帝五世之孙为阿育王。日本应神天皇时，为避难携母子及同伴七人东渡日本，入日本籍。天皇封他为大和国桧隈郡之使主。……其后代丹波康赖著《医心方》三十卷”

丹波康赖是日本著名的汉医师，按照丹波家族世代相传的说法，来日本是为了躲避三国时期的战乱，来日本时带有一些中医书籍和祖传秘方。这大概是中医典籍最早传入日本了。魏晋时代，日本来到中国朝贡和中国派往日本授封的使节有好几批，其间不乏“传送文书”之类的事情，合理

想象其中也包括一些汉文典籍，恐怕不会离史实太远。

继体天皇七年(513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尔由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带来了多种儒教经典，儒经的学习在日本越来越普及。钦明天皇七年(538年)，日本又从百济引进了已由中国翻译成汉字、并加以注疏的佛教经典。凡此种种，都表明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正在越来越迫切地汲取中国文化。要达此目标，首先自然就要不遗余力地掌握汉语。事实也是，日本上层社会中学会使用汉字的人逐渐增多，例如《宋书·夷蛮传》记有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所上的表文，文辞雅驯，已经能够明白地用汉文表达意思了：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祚，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¹³⁾

虽然该表文显然出自“归化人”、“渡来人”的手笔，并且学者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经过了中国文臣(一说为沈约)的润饰，但毕竟这是流传至今的日本人(尽管是移民的后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可以说明当时日本对汉字应用的水准已经比过去大大提高了一步。

二、汉字在日本社会的逐渐展开

与日本官方热衷于接受中国的印绶和典籍相映成趣，汉字也在日本的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三国时代或者稍晚一些，日本民间出现了摹仿中国铜镜的仿制镜。镜上的铭文，多用汉字写成，但却并不是通顺的汉文，如“吾作铜镜甚独奇”；“吾作明竟真大好，浮由天下四海，用青同至海东”；“吾作明竟甚独，保子宜孙，富无訾奇”等等，语意只是勉强可知。同时，这些镜上汉字的写法，有的也与中国字不同，还有一些将天干地支排列顺序颠倒的情况。看来这些铜镜的制作者或许懂一点汉文，但水平不高；或许根本就不懂汉文，只是把刻在中国铜镜上的文字，当作花饰图案，照葫芦画瓢地描下来。

进入五世纪后，器物上的汉字铭文更为丰富了。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古剑上面刻有115字的汉文铭文，据研究是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雄略天皇(即倭王武)时的器物。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刻有如下的铭文：“治天下瓠□□□齿大王世，奉□典□人名无□弓。八月中用大镡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練六十拮三寸上好□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々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書者张安也”。由此可见，作刀者大概是日本人，而书写汉字铭文者则可能是“归化人”、“渡来人”。当时恐怕一般的日本人使用汉字还有一定的困难。以上的两件铭文，是目前所知日本国内书写的最古的金石文。

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所藏的人物画像铜镜，大约是公元443年或503年的器物，上面的铭文是用一种很不好懂的汉文写的：“癸未年八月日十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斯麻念长寿，遣开中费直穰人，今州利二人等取白上同二百旱作此竟”。作于推古四年(596年)的《元兴寺露盘铭》，也是用这种中国人看不大懂的汉文写的。显然，这已经不是书写者汉语水平的问题，而是当时日本结合本国的情况，利用汉字表音，将一些汉字当作表音文字使用了。这可以说是后来的“万叶假名”的萌芽。这些铭文的书写者，仍主要是那些归化人，露盘铭中的“书人百加博士、阳古博士”的署名即是又一明证。

大致说来，从公元前后汉字开始传入日本到六世纪末的六百年间，这一时期是日本学习汉字和汉文的初始阶段。在这一时期中，汉字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所熟悉，汉字、汉文和汉籍的教学逐渐在日本社会展开。但能掌握和使用汉字汉文的，主要还是所谓的归化人和渡来人，目前尚未发现日本人自己已经登场的证据。从整个日本社会来讲，汉字还只是外交和贸易上的实用符号，而不是表现思想的工具。

从七世纪开始，汉字在日本的情况为之一变。与前一时期汉字的书写须假手于归化人、渡来人不同，日本人自己也能写出漂亮得令人吃惊的汉文来了。

593—622年，推古天皇的外甥圣德太子摄政。推古十二年(604年)，颁布了著名的宪法十七条。《日本书纪》记载了宪法十七条的原文：

“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和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

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复地载，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复天，则致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

……，……”⁽¹⁴⁾

这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以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来看，宪法十七条的出现似乎太突然了，但史有明载，圣德太子的汉文水平确实是极高的。推古十六年(608年)，隋朝的使臣裴世清等持国书至日本，天皇“宴世清等于朝。帝问皇太子曰：‘书辞如何？’太子曰：‘赐诸侯书式也。然曰皇曰帝，其义一矣。彼之书用皇字，宜答书以报也。’帝从之”⁽¹⁵⁾。于是，

“太子亲草书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愈。此即如常。今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¹⁶⁾

圣德太子能亲笔写出这样的国书，当然也可能写出宪法十七条来。即使十七条宪法并非圣德太子的手笔，太子周围也一定聚拢着一批懂中文的日本人谋臣能吏，奉太子之命几度出使隋朝的小野妹子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推古十五年(中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前往中国，在携带的国书中记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¹⁷⁾。据说，这就是日本国名的始来。次年，隋朝向日本派出了答礼使节，小野妹子陪同他们一起回国。该使节归国之际，小野妹子又一次伴随他们前往中国，正是这次国书的开头，使用了圣德太子起草的“东天皇敬白西皇帝”⁽¹⁸⁾的文句。随着这几次遣隋使，圣德太子还派遣了僧侣和学生前往中国留学，这些人后来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日本想从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国学习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是把汉字、汉文作为国际通用语来学习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书写记录日语的工具。因此，自圣德太子始，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日本一直力图与中国施行对等外交，却并没有创造本国文字以示国威的企图；最终，还是与汉字、汉文紧密相联，渐渐地完成了能忠实记录日语的一套表记体系。如果说十七条宪法显示的是完完全全的汉语，尚未表现出日本语的特点的话，那么，在熟练地掌握了汉字、

汉语的用法之后，汉字的日本化、即按照日语的特点使用汉字的条件和时机也就成熟了。

三、汉字在日本的民族化趋向

圣德太子摄政时，建造了法隆寺。621年圣德太子薨，次年为了表示对圣德太子的哀悼，铸造了一尊佛像，背面刻有一篇文章，这就是著名的《法隆寺金堂药师造像铭》。铭文曰：

“池边大官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与太子誓愿赐：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官治天下大王天皇及东宫圣王，大命受赐而岁次丁卯年仕奉。”

其中一些句子使用的是日语的语序，而“大御身劳赐”、“誓愿赐”、“崩赐”、“受赐”的“赐”，则是把日语的敬词翻译成汉字，依照日语的词序，接续在表示名词、动词的汉字之后，以反映包括词尾在内的日语全貌。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尾崎雄二郎先生解释说，这个“赐”字跟《古事记》中常能看到的“独神成坐”“自天降坐”等里面的“坐”字用法差不多，即日语敬语表现“ごさいます”中的“さ”⁽¹⁹⁾。

同是为悼念圣德太子，太子妃锈制了一幅“天寿国绣帐”，上有铭文，表现出汉字被日本接受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向。《绣帐铭》中固有“世间虚假，唯佛是真”这样的名句，更有类似“斯归斯麻官”、“阿米久尔意斯波留支比里尔波乃弥己等”、“巷奇大臣”、“伊奈米足尼女”、“高丽加西溢”、“汉奴加己利”等用汉语完全无法理解的词语。但如果从汉字在日本传播的历史上来认识则毫不足奇，这不过是借用汉字的字音来表記日语罢了。

总之，自圣德太子时代起，日本人一方面全盘接受汉字的形、音、义，来摹仿书写汉文；另一方面，则开始尝试利用汉字记录日语了。

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汉字的字体，出现了不少异化的现象。试以《法隆寺金堂释迦造像铭》(623年)中的字体，与后来的《康熙字典》中的字体相比较(括弧里的是《康熙字典》的字体)：

土(土)	正(正)	此(此)	共(共)
於(於)	若(若)	定(定)	俠(俠)
乘(乘)	紹(紹)	脱(脱)	莊(莊)
尊(尊)	等(等)	發(發)	歲(歲)
敬(敬)	微(微)	蒙(蒙)	福(福)
懷(懷)	隱(隱)	願(願)	轉(轉)

从中国的《别体字类》一书来看，这些异体字在中国的金石文中也曾经有过使用的实例，当时日本在输入汉字的时候，尚未来得及对正字和异体字进行一番考证辨析，便把异体字照着样子搬进来了；何况，当时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权威来认定何为正字，何为异体字。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尽管中日两国使用的汉字系出同源，但形体不同的不乏其字。其原因，大概是起初中国的文字并没有定于一尊，以后逐渐统一化、规范化了；而日本的汉字在另一种环境中发展，尽管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中国，但毕竟已经带有了本土的一些特点，后来也逐渐地统一化和规范化，结局却是与

中国很不相同了。

事情很清楚，进入七世纪以后，汉字和汉文在日本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刻了。这时，不仅已经能够见到不亚于中国本国的汉文，而且大量证据表明，汉字和汉文在日本已经开始了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飞跃，与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越发扩大，人员往来的愈加频繁是分不开的。从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率队前往洛阳起，日本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遣隋使”、“遣唐使”计划，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遣华使节及大批留学生、留学僧负笈中华，孜孜不倦地汲取包括汉字、汉文在内的中华文明，这当然会有力地促进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加强汉语在日本的影响。

到了八世纪，《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风土记》、《正仓院万叶假名文书》等纷纷问世，给我们提供了能够描绘这一时期汉字与日语关系全貌的大量文献资料。

《古事记》作于712年，既是现存的日本最古的历史书，又是最早的日文的文学书。但是，“它的本文部分其实是中文、日文混淆的怪文章”⁽²⁰⁾，这种文体的先驱就是上述《法隆寺金堂药师造像铭》。

《古事记》的序是纯粹的汉文，序中对何以采用这种怪文体作了解释：

“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即辞理叵见，以注明；意况易解，更非注。”

可知古代的日语，词汇和意思都很质朴，借用汉字来书写、表意，产生了一些困难。如果只用“训”、即使用汉字的意义表述日语的意义，往往无法表达确切；而如果只用汉字来标音，文章也会变得冗长累赘。于是决定采取音、训互用的方法，使用日本式的变体汉文来记述。在意思容易理解的时候，不加注，只有当词意难以理解时，才用注来说明。

编修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则是仿效中国正史的体例，使用正规的汉文书写的编年体历史书。此后，藤原继绳编有《续日本纪》，藤原冬嗣编有《日本后纪》卷，藤原良房编有《续日本后纪》，藤原基经编有《文德实录》，藤原时平编有《三代实录》，合以《日本书纪》为六国史，均属汉文著作。正史用汉文书写的流风，一直延续到近代。作史的体例、记事的方法、修史的精神乃至修史的宗旨，也都是仿效中国。那么，为何《日本书纪》这一书名与中国史书命名不大相合呢？已故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先生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本来该书仿《汉书》《后汉书》，定名为《日本书》，体例也依中国正史，开卷就是“纪”部分，应该写“日本书、纪第一卷”等几个字。可惜这本书除了“纪”部分，再没有“志”、“表”、“传”等部分，所以全书从头至尾，卷端都应该标“日本书、纪第几卷”，结果后人误认为《日本书纪》是书名了。

《万叶集》是日本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大约成书于770年。它以八世纪前后的诗歌为中心，集中了日本古代诗歌约四千五百首。在《万叶集》中，汉字的音和义都被用来书写和歌，其中那些只表音、不表意的汉字就被称作“万叶假名”。例如，在日本的固有语言中，“秋”的发音是“AKI”，《万叶集》里或用汉字标音，写成“阿伎”、“安吉”；或直接利用汉字的意思，写成“秋”、“秋时”。又如，“云”的日语发音是“KUMO”，《万叶集》中或标音为“久毛”、“君母”，或写作“云”。在《万叶集》中，用来标音的汉字还很不固定，比如表示“MO”这个音节，除了用“毛”字外，还可以用“母”、“茂”、“莫”、“暮”、“木”……等汉字，意义完全相同。“万叶假

名”在在表现出一种新事物刚刚诞生时的特征，作为一种文字当然是很不完备的，但它充分显示了日本人试图运用汉字书写日语的苦心和探索。

713年，元明天皇命诸国将各地地名的由来、物产、古代传说等编写进献，随后编成了日本古代的地方志《风土记》，包括成书年代先后不同的《出云国风土记》、《播磨国风土记》、《常陆国风土记》、《丰后国风土记》、《肥前国风土记》等部分，大致都写成于八世纪上半期。《风土记》的文章，以汉字和汉文为中心，同时利用“万叶假名”的方法，对各地的地名和物产作了详细的记述。值得注意的是，《风土记》中记载的天皇诏命，多系口语形态，为了表达清楚，多将独立语和日语特有的助词、助动词、活用语尾加以区别：助词、助动词和活用语尾用小字的万叶假名来表示。这显示了日本人对日语和汉语的语法形态的不同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在汉字日语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正仓院文书》，是记述从大宝二年(702年)到奈良时代末日本社会状况的原始材料。尽管书中许多文字破损或字迹不清，但是保存了大量用汉字标记的古地名、人名、官职名、物品名和租税名等，同时也提供了当时汉字的字体和用法的第一手资料。不难看出，当时日本各地能够掌握汉字的人已经越来越普遍了，汉字的应用也已经越来越广泛了。

至于传入日本的汉字的读音，反映的是中国什么时代、什么地区的声韵呢？奈良时代末期，发生了一件在日本汉字传播史上值得一记的事情，有助于我们明了这个问题。延历十一年(792年)闰十一月，天皇颁布诏令：“敕明经之徒，不可习吴音，发声诵读既致讹谬。熟习汉音”⁽²¹⁾。次年四月，再次发布政令，明确指定必须熟习汉音：“制。自今以后，年分度者非习汉音，勿令得度”⁽²²⁾。延历十七年(798年)，再下诏令：“用汉音，读五经。明经之徒从之读十三经也”⁽²³⁾。什么事重要得竟使天皇连下诏书？原来，在汉字传入日本的漫长时间里，汉字的读音是按照古音、吴音、汉音、唐宋音的顺序依次传入的。所谓“古音”，据说是中国周代的汉字读音，但是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学者很多。至于“吴音”，被认为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标准音，经过朝鲜渐渐传到日本，层次重叠，并非纯净，但伴随着佛教而来，深入日本社会底层。所谓“汉音”，则是中国隋唐时代的北方音，是一套较纯洁、较有系统性的当时的标准音。所谓“唐宋音”，是日本镰仓时代、室町时代与宋、明交往时传入的中国的南方音，其传入日本的时期较迟，影响也较小。对日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吴音和汉音。

七、八世纪，较早传入日本的吴音，早已渗透日本人的社会生活，成为老百姓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比如，日本人数数儿：いち(一)、に(二)、さん(三)、し(四)、ご(五)、ろく(六)、しち(七)、はち(八)、く(九)、じゅう(十)、ひゃく(百)、せん(千)、まん(万)都是吴音。然而，此刻奈良朝廷醉心于隋唐王朝的繁荣和文明，而隋、唐王朝的都城，是在中国北部的洛阳和长安。一批又一批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出发又归来，他们带回来的主要是中国北部的汉音。同时，有一些中国北方的文士来到日本，对于以汉音取代吴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袁晋卿者，到日本后赐姓清村宿祢，“晋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²⁴⁾。据说他“遥慕圣风，远辞本族。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²⁵⁾。这些，对日本朝廷的影响非同小可。于是，便有了前述的以汉音取代吴音的奖惩敕令。日本朝廷在提倡汉音上所表现的执拗与热烈，足以表明奈良朝廷积极推行汉音的热情，反过来，它也说明了吴音的势力在当时是如何的强大。

奈良朝廷以汉音取代吴音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似乎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发生吴音完全被汉音取代的情况。从现存的平安时代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佛教经典，大体上还是用

向来的吴音传承，而中国的史书和与儒教有关的书籍，则往往是用汉音记述的。渐渐，朝廷也默
认了民间的实际情况，上述延历十七年的诏书中已经允许“诗文杂书，吴、汉杂用。佛书仍旧以
吴音读焉”⁽²⁶⁾。到869年，干脆宣布“汉音废而无试”⁽²⁷⁾。由此，就形成了如今日语中吴音语、汉
音语、吴音向汉音转化语并行不悖的局面。

四、日本文字从汉字中脱胎而出

继奈良时代之后的平安时代，指的是从延历十三年(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到建久三年
(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这一历史时期。这四百年，是日本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日本由前一时期的主要是大量引进和输入中国文化，转为主要是对中国文化进行
消化和吸收，使之民族化。

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汉字的使用逐渐渗透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除了抄写经书和书写重大
文件之外，日常使用的文字，自然以能写得更快一些为好。要写得快，当然就要想办法减少汉字
的笔画，这与中国人日常使用汉字时的心理是一样的。而且，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汉字，尽管
可以清晰地表示概念，却难以妥善地表现日语的活用词尾和助词、助动词。在利用汉字书写日
语的过程中，如何把表意的汉字与记录活用词尾、助词、助动词的表音的部分区别开来，使之易读
易懂，成为一个大问题。日本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历了很长的摸索过程。在《万叶集》里，
表意的汉字和纯粹表音的汉字混用，难读难懂；后来，在表音时尽量使用表意时不使用的汉字，
且尽量用固定的两三个字表达一个音节，力图避免一个汉字既表意、又表音所造成的混乱，这固
然有所进步，仍然麻烦不少。总之，社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在字形上能与汉字加以区别，
字母的数量相对较少，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又能忠实记录日语的新文字。于是，作为表音文字的
“假名”就应运而生了。《周礼》“外史篇”的注说：“古曰名，今曰字”，“假名”即假字。假，借
也，“假名”就是借用过来的文字。最迟不晚于九世纪前半叶，依据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的片假名
和模仿汉字草体书写的平假名先后问世，从此，日本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字，日本人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愿，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文字进行记述了，这标志着日本文化史的新里程。

下表⁽²⁸⁾显示了假名的字源和字形发展演化的轨迹。不难看出它们均由汉字脱胎而出，与汉字
有直系血缘联系。

片假名的字体和字源

ク	キ	カ	オ	エ	ウ	イ	ア
久	幾	加	於	江	宇	伊	阿
ク	キ	カ	オ	エ	ウ	イ	ア
ク	キ	カ	オ	エ	ウ	イ	ア
ク	キ	カ	オ	エ	ウ	イ	ア

平假名の字体和字源

け	く	き	か	お	え	う	い	あ			
計	久	幾	可	加	於	衣	江	宇	以	阿	安
け	く	き	か	お	え	う	い	あ			
け	く	き	か	お	え	う	い	あ			
け	く	き	か	お	え	う	い	あ			

ヌ	ニ	ナ	ト	テ	ツ		チ														
奴	二	奈	止	天	川	知	千														
ヌ	ニ	ナ	ト	チ	川	知	千														
				テ	川																
				テ	川																

マ	ホ	ヘ	フ	ヒ	ハ	ノ	ネ														
万	保	部	不	比	八	乃	子														
マ	保	部	不	比	八	乃	子														
マ	保	部	不	比	八	乃	子														
				ヒ	ハ	ノ	子														

ラ	ヨ	ユ	ヤ	モ	メ	ム	ミ														
良	與	由	也	毛	女	牟	三														
ラ	ヨ	ユ	ヤ	モ	メ	ム	ミ														
ラ	ヨ	ユ	ヤ	モ	メ	ム	ミ														
				モ	メ	ム	ミ														

ン	ヲ	エ	ヰ	ワ	ロ	レ	ル	リ													
ン	ヲ	エ	ヰ	ワ	ロ	レ	ル	リ													
ン	ヲ	エ	ヰ	ワ	ロ	レ	ル	リ													

日本学者也都认为，平假名不过是汉字的“草书”，而片假名则是汉字的“省文”。

至此，由万叶假名发端的日语的表记文字已基本上就绪了，随之而来的，是继《凌云新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性灵集》等汉诗文学之后，假名文学的兴盛。这一时期问世的和歌、日记、随笔、游记、物语，如《竹取物语》、《伊势物语》、《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土佐日记》、《蜻蛉日记》、《和泉式日记》、《枕草子》等等，数量之多，不胜枚举。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假名处于主要的地位，而汉字则扮演着配角。

物语显然与汉语没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主要用来表达男女情爱、抒发个人情感的和歌，也对汉语具有一定的排斥性，这是因为歌谣不仅要表达清晰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要体现出日语韵律的和谐与优美，在这方面，假名自然比汉字优越。不过，在这些所谓的“国文学”中，汉字出现的频度也有所不同，著名的《源氏物语》就比较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大概在于汉字的使用当时主要是上层社会显示教养和知识的一种表征，《源氏物语》出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官紫式部之手，其中比较多地出现汉字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汉字已经成为日语表述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使用起它来驾轻就熟，可以平添许多方便。

然而，当时在日本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应该说仍然是汉字和汉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正式的文字、文章、文件，毫无疑问应该使用汉字、汉文，这个观念经过长期的熏陶，在社会上、在政府里、在知识分子中早已经根深柢固了。《土佐日记》的作者纪贯之，本是个须眉男子，汉文非常漂亮，他模仿女子的口气，使用假名写作日记，大大推动了假名文学的发展。但是天皇钦定敕撰《古今和歌集》，由他写序时，他写了一个假名序，同时又写了一个真名（汉文）序。《和歌集》尚须汉文序以示郑重，可见假名的诞生，并没有动摇汉字、汉文的统治地位。

一千多年来，日本的文字，还是以汉字为主体。从根本上说来，所谓“假名”，就是相对于汉字的“真字”、“真名”而言。日本人写的汉文文体的文章，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史书有《续日本纪》、《日本后纪》、《日本三代实录》等，法制书有《令义解》、《令集解》、《延喜式》等，汉诗文集和诗论有《凌云新集》、《文华秀丽集》、《性灵集》、《菅家文草》、《本朝文粹》、《文镜秘府论》、《世俗谚文》等，高僧往生传有《日本往生极乐记》、《大日本国法华验记》等，可称洋洋大观。

在汉文文体之外，被称为“汉字与假名交织文”的文体得到长足的发展。大约脱稿于九世纪的《东大寺讽诵文稿》，是初期的“汉字假名交织文”的典型。其中第219—221行是这样标记的：

“大悲ノ芳懐ヲ為昼夜之眠所、大恩而膝ヲ為朝夕之游庭、含ミ悲ヲ相ヒ笑エマヒ給ヒシ
紅ノ　ヲモ今モ見テシカモヤ。”

在这种文体中，汉字是表意义的，假名是表音节的；汉字占了句子的主要成分，假名则只是句子的辅助部分。汉字与假名并用，既能从视觉上使读者对词语表达的概念一目了然，又能从音韵的角度忠实地反映日语的外形。

以“汉字假名交织文”为代表的变体汉文，奠定了今天日语标记方法的基础。现存的《大日本古文书》、《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记录》、《史料大成》、《平安遗文》、《史料纂集》、《群书类从》等古籍中，变体汉文的实例数不胜数，俯拾皆是。当时皇室、朝廷和诸侯，也大都采用这种文体纪事。由号称“三代御记”的《宇多天皇御记》（又称《宽平御记》）、《醍醐天皇御记》（又称《延喜御记》）、《村上天皇御记》（又称《天历御记》）开其端，高官、诸侯纷纷仿效，藤原忠平的《贞信公记》、藤原师辅的《九历》、藤原实资的《小右记》、藤原道长的《御堂关白记》、藤原行成的《权记》、源经赖的《左经记》、藤原师通的《后二条师通记》、藤原实忠的《中右记》、藤原忠实的《殿历》、中山忠亲的《山槐记》、藤原兼实的《玉叶》等等，无不如此。变体汉文不断发展，逐步成熟。今天日本最通行的汉字假名混合文体，就是在这发展变化的延长线上形成的。

尾崎雄二郎先生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位日本的大学教员跟美国籍的同事较量：日本人看日文报，美国人看英文报，在被限定的时间内，比一比谁获得的信息更多。报看完后，两个人各自把遗留在自己脑子里的信息写出来决定输赢，结果日本压倒了美国。尾崎先生说：“这很简单，因为在日文报纸里被采用的‘汉字假名混合文体’本来具有的传达信息的能力，远远超过单单用拼音文字来排版的英文报纸传达信息的能力。……因为汉字占有的面积，比起有时要拼到十几个以上的拼音文字来当然要少得多，所以一看见就抓得住它的全体”。尾崎雄二郎先生还进一步说：“‘汉字假名混合文体’里边的假名部分，它们发挥的功能，其实有时不过是因为作为一种空白部分而显现汉字的存在的原因也说不定。而且，假名部分本身也分别用片假名和平假名来写，片假名的部分以表示有关西洋的词语为主，平假名则专门表示日文，这样把重要部分显现出来的功能越来越明显。”

总之，日本引进汉字，巧妙地为我所用。今天日本汉字的读音，不管原来是吴音汉音，都经过或大或小的变形，是日语化了的音；日语汉字的意义，除了“万叶假名”式的以字注音的“当字”（如“油断一秒，怪我一生”的“油断”、“怪我”不过是表示“ゆだん”、“けが”的音罢了）以外，根据日本的需要，或保留古训（如“湯”“走”），或加以引伸（如“玄関”，中国原指寺庙正门，日本引伸为一般日式建筑进屋脱鞋之处），成为日本文化有机的一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又利用汉字积极输入西方文明。如“哲学”、“演说”等词语，就是这一时期日本的创造；象“共和”、“民主”“革命”等见于中国古典文献的词语及“唯心”、“印象”、“意识”等见于汉译佛典的词语，是日本赋予它们当今通用的新的意义。日本凭借汉字，把欧美的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译成明白易懂的日文，使新思想、新科学得到普及。所以有日本学者说：如果那时没有活用汉字的话，日本吸收欧美发达的学问，恐怕要迟得多⁽²⁹⁾。

五、简短的结语

从公元前后汉字开始传入日本，到平安时代日本根据汉字创造出自己的文字，是一个将近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汉字传入日本，不仅对日本的文字，而且对日语的发音、语汇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人是把汉语当作国际通用语、当作中华先进文明的语言载体来认识 and 学习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输入汉字、汉文，不仅仅是寻求记述日语的书写手段，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从中国输入先进的文化。要达此目的，就要不断地与中国接触，频繁地与中国交往。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和演变，伴随着日本的文明开化、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传播和演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文化发展史的浓缩和写照，同时也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例证。汉字沟通中日两国，书写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光辉篇章。

注：

- (1) 明治初期，日本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一些人对日本文字采用汉字感到不满。明治十八年到二十一年的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曾主张用英文做国语。后来又出现了“假名文字会”和“日本罗马字会”两个组织，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前者主张废除汉字，纯用假名；后者主张用罗马字拼写日语，把汉字和假名一起废掉。参阅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稿·中国与日本文字改革的比较观察》，商务印书馆，1985年。
- (2) 《漢字を語ろう》，《読売新聞》1997年4月3日。
- (3) 参阅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13页。
- (4) 见《日本书纪》“应神天皇条”。《古事记·中卷》也有记载，且明言和迩（“王仁”日本音读若“和迩”）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来日。有学者考证，或曰《论语》十卷为郑玄所注，或以为何晏集解；《千字文》传为魏钟繇之作。
- (5) 荻生徂徕曾说：“吾邦有王仁而人读书识字；有吉备真备而人传经芸；有菅原道真而人诵文史；有惺窝而人称天语圣”。可见视王仁地位之重要。
- (6)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燕地》。
- (7) 《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
- (8)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 (9) 《邪馬台国論争に新資料》，《読売新聞》1994年3月18日。
- (10) 《三国志》卷三十《魏志·倭人传》。按：这里的“景初二年”有误，当作“三年”。《梁书》、《日本书纪》等所引《魏志》文，均作“三年”。

- (11) 《卑弥呼に贈られた鏡?》,《読売新聞》1994年3月18日。
- (12) 《幻の古代織物「班布」か?——卑弥呼が中国にも献上——奈良・下池山古墳から出土》,《読売新聞》1996年7月12日。
- (13) 《宋书》卷九七《夷蛮》。
- (14) 见《日本书纪》“推古天皇条”。
- (15) 《大日本史》卷八十七《圣德太子传》。另据同书记载:“推古十五年,奏请使大礼小野妹子聘于隋,其书皆太子之词也”。
- (16) 《大日本史》卷二四二《诸蕃》十一。
- (17) 《册府元龟》卷九九七《外臣部·悖慢》。
- (18)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条”。按:“天皇”一词,也来源于汉语。在中国道教中,天皇乃统治上天的皇帝的意思。由《大日本史·圣德太子传》可知,正是为了要使倭王与中国的“皇帝”对等,圣德太子采用了这一称呼。
- (19) 尾崎雄二郎《中国文字在日本》,《文史知识》1996年第7期,中华书局,原文汉语。
- (20) 同上。
- (21) 《日本纪略》延历十一年闰十一月二十日条。
- (22) 《类聚国史》佛道部。《日本纪略》亦载。
- (23) 《延历十七年官符》,引自筑島裕:《国語ノ歴史》。
- (24) 《続日本紀》宝龟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 (25) 《遍照发挥性灵集》,真济编。该书为空海的诗文集,成于835年。
- (26) 《延历十七年官符》,引自筑島裕:《国語ノ歴史》。
- (27) 《类从三代格》,贞观十一年五月七日。
- (28) 取材于《漢字講座》第4卷《漢字と仮名》附録三“平仮名の字体と字源”和附録四“片仮名の字体と字源”。明治書院,平成元年。
- (29) 山口修:《日中交渉史・文化交流二千年》,東方書店,1996年,第157页,原文日语。

参考文献:

1. 日本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年表》,岩波書店,1966年。
 2. 児玉幸多等:《日本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95年。
 3. 大谷浩三等:《日本史精説》,河合出版,1993年。
 4. 大庭修/王晓秋主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 [1]. 歴史》。
 5. 木宮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6. 山口修:《日中交渉史・文化交流二千年》,東方書店,1996年。
 7. 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
 8. 筑島裕:《国語ノ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昭和52年。
 9. 佐藤喜代治:《漢字と日本語》。
 10. 高松政雄:《日本の漢字音》。
 11. 佐藤武義:《古代の漢字とことば》。
 12. 峰岸明:《漢字と仮名の使い分け》。
- (9~12均见于明治书院昭和62年以后陆续出版的《漢字講座》。9、10见于第3卷,11见于第5卷,12见于第4卷)